

短論·觀察·隨筆

知識吸收與東亞文明的興起

● 黃朝翰、楊沐

幾百年來，在不同的時代，經濟學家們重視不同的生產要素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從勞力、土地、自然資源、資金，到管理和科技。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們發現，這些要素的貢獻，關鍵是它們所擁有的知識含量。勞力的貢獻，關鍵是他們所受教育的程度；資金的貢獻，關鍵是它所物化的資產中技術的先進程度。「新經濟版圖不在科技裏，亦非在晶片，或是全球電訊網路，而是在人的思想領域裏。」^①

知識經濟給我們帶來了分析問題的一個全新的視角。只有知識最具有增長的潛力。近半個世紀以來，東亞是世界各地中持續保持經濟的高速穩定增長的唯一板塊，其奧秘就在於東亞文明具有積極學習外來知識的傳統。

一 東亞文明：吸收外來知識與相互學習

東亞是一個地域概念，包括亞洲東部和東南部的國家和經濟體。由於

1950年代以來的飛速發展，東亞引起世界的注意。該地區的一個特點是，要麼是華人(或華人後裔)居住區，要麼長期以來受華人文明的影響。

華人文明始於五六千年前。考古所發現的華人文明來源，有黃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黃河上游的馬家窖文化、齊家文化；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內蒙古的紅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等。從一開始，華人文明就是多源頭的、非排外的，由各種來源的知識所組成^②。

華人文明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奠定於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那時，一方面，諸子百家爭鳴，共同塑造了華人文明的精神走向^③，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上各古老民族大融合。漢唐以後，又有佛教的傳入、道教的興起、中原文化和西北游牧文化的碰撞衝擊。華人文明繼續在與東亞和多種文明的融合和碰撞中發展。最家喻戶曉的故事則是玄奘於唐貞觀元年(公

元627年)西去印度取經。中國人吃的羌餅、番茄、番薯、玉米；用的椅子、凳子；穿的胡服、旗袍、西裝；欣賞的胡琴、羌笛、琵琶等，都是從其他文明中引進的。更不用說組成近代和現代華人文明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進化、邏輯、幽默、禮貌、社會、經濟、科學等等。

華人文明向東亞地區的傳播，始自隋唐。日本在公元600年和630年，分別派出了他們的第一批遣隋使、遣唐使，此後二百年間共派出十八批。新羅在公元668年統一朝鮮後，也派出了很多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日本和朝鮮的文字創制都受到漢字的很大影響，漢文的典籍、書畫、儒家思想和中國化後的佛教，一千多年來，一直在日本和韓國廣為流傳。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大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如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方，即為漢代商船的必經地。近年來，唐宋的瓷器、錢幣，常在東南亞各國出土。大約五六百年前，明朝永樂皇帝派鄭和率領二萬八千八百餘人次七下西洋(今加利曼丹、馬六甲、斯里蘭卡，到非洲一帶)。近代的文字記載，自1821年第一艘中國商船到新加坡後，以後每年都有150至250艘船來到新加坡。沿着這條航道，近兩百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陸續進入東南亞諸國，華人和華人移民的後代，已成為東南亞各國人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所帶來的華人文明，已經融入當地原有的各種文明之中。

因此，東亞各國在走向現代化前的一個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華人文明的影響。華人文明是走向現代化前的各東亞文明中最明顯的共同組成部分，而華人文明自身也是在受東亞

和其他文明的各種影響中發展起來的。

早在1970年代，當日本剛崛起時，著名學者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就在美國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指出受這個文化區影響的其他國家一定也會走上迅速發展的道路。1980年，當時的英國國會議員、後來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馬若然(Roderick MacFarquhar)在《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上發出了一個驚人的預言，認為在日本之後，一些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經濟體也會迅速趕上來，西方遲早會面對一個重新站起來的中國④。

二 重視學習是東亞文明的重要傳統

好學和重視學習是東亞文明中最重要傳統之一。古代中國向印度佛教學習、古代日本和朝鮮向中國學習、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向西方學習、中國戊戌變法前後向西方和日本學習，都是自覺的(雖然往往是被差距刺激下的自覺)、主動的學習。

東亞的學習傳統是從儒家的孔子開始的，孔子是在中國的歷史上最開始勸學的一位思想家。他不認為自己是「上智」，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從實踐中認識到，要認識事物，就要靠「學而知之」，要「多聞」、「多見」、「多識」、「多問」。要廣求知識，博學多能，擇善而從，知不善而改。

孔子最早把學習和人生的價值聯繫在一起。《論語》的開篇就提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學習和經常使用所學到的知識，就是一種樂

趣、滿足。這裏超越了階級、等級、貧富、性別、老少等所有差別，只要學和習，只要追求知識，就會有快樂。與兩千年後西方行為科學家馬斯洛 (Abraham H.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相比，這種快樂和滿足，不需要分層次，不需要以收入水平 (財富) 和社會地位 (權力) 作為條件，不需要在每一個金字塔的階上去進行有你我我的零和博弈。

這種學習是為己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人生價值。孔子認為其七十二名賢徒中，顏回最優秀。儘管顏回的生活很貧苦，地位很低下，一生很短暫，也沒有能用他的知識去建功立業，但他真正地知道了學習對人生的價值，過得很滿足、很幸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認為顏回得到了他的真傳。

孔子和儒家認為，「己」是社會上所有人際關係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如果每個「己」都是這樣的好學之人，都是能在學習中知善而從，知不善而改，都是能在學習中提升自己 and 滿足自己之人，並在此基礎上做到「己立立人，己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能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的基礎。

自漢以來，中國歷來的統治者都推崇儒學。後世的儒把學習的道路歸結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儘管與孔子為己之學的原意不同，但卻打開了讀書做官，即另一條為己之學的名利之路。「書中自有黃金屋」，成為億萬黎民百姓的「成功之夢」。「金榜題名時」成為華人和華人家族最大的滿足感之一^⑥。在大部分華人心裏，追求知識和追求財富、追求權力變成了同義詞。

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勢構成東亞文明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無論是在東

亞的甚麼地方，子女能否上一所好的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都永遠是每個華人家庭的頭等大事^⑥。每個小康家庭，都會創造各種條件，讓自己家的小孩能在課外去學英語、鋼琴、小提琴、舞蹈、繪畫等等。為成年人舉辦的各種培訓班、證書課程、外語和電腦教學，是服務業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這些地區的老人，多樂意上老年大學，上各種培訓班，在學習書畫、詩詞、插花、茶道、太極拳等傳統文化，或電腦、網絡、博客 (Blog)、動漫等各種新知識中，找到自我滿足的樂趣^⑦。

三 東亞文明中的留學和海歸大潮

把子女送往最好的學校，在古代是書院，在現代是名校。擁有比國內更多的知識量和先進科學技術的歐美大學，則成為首選。很多例子表明，即使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只要有條件，都會把子女送往國外留學^⑧。1950年代，全世界的留學生僅數萬人，1980年代100萬人，1990年代150萬人，到2004年達250萬人，增長最快的是來自東亞的學生。在全世界的出國留學生中，1999年時，來自東亞和西歐的留學生還不相上下，2004年東亞的留學生已超過西歐的三分之一。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出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佔全球出國留學生總數的14%^⑨。

近代第一個到西方的東亞留學生是中國的容闈。他原在澳門的教會學校讀書，被主持校務的布朗博士 (Rev. Samuel Robbins Brown) 帶回美國，於1850年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回

國。「要把生平所學見諸實用」的儒家傳統，激勵着他要讓更多的中國人，像自己一樣到美國學習。經過多年的持續努力，1870年容閔的建議在曾國藩、李鴻章的支持下，獲得批准，清政府決定挑選120名幼童學生到美國留學，分四批，每批三十人。在保守派的反對聲中，1881年，120名中的94名分三批回國，其中，真正完成大學課程的僅詹天佑和歐陽賡兩人，有六十餘人尚在大學學習中，其餘還都是中小學生。差不多在同一期間，清政府還派出了四批留歐學生到英國和法國學習航海和造船技術。他們回國後儘管沒立刻被重用，但日後幾乎都成為了中國的海軍和造船工業的骨幹力量，其中的嚴復為著名翻譯家，為中國介紹了一批西方的社會科學名著，畢生致力於把西方知識引進中國社會。梁啟超說，「西洋留學生於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⑩。

日本留學生的出國，開始時也是阻力重重的。1854年，吉田松陰曾冒着生命危險企圖搭乘美國船隻出國留學，因而被捕入獄。1862年，日本幕府正式派出第一批留學生到荷蘭學習，比容閔留學美國晚十二年，比清政府派留學生出國，也不過只早了八到九年。但這時大多數日本的知識份子已希望出國學習西方知識。「脫亞入歐」，尚「洋才」已成為風氣。以後，一批早期的留學生歸國（日本的海歸），並很快成為明治維新的領軍人物、內閣成員的主要組成。他們用所學到的西方知識，開創了日本全新的歷史時期^⑪。

由於這種對西方知識的認知上的差距，導致對留學生使用上的政策差距，最終使中日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差

距愈來愈大。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同年，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試圖效法明治維新。儘管變法失敗，但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廣為流傳，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興起了向日本學習的熱潮。1896年，清朝首次派出留學生十三人到日本。1899年留學日本的人數增加到200名，1902年400多名，1903年1,000名，1906年約8,000名^⑫。在一百年前，一個國家一年內就有近萬名留學生出國學習，這是驚人的。在這些留學生中，有以後中華民國的奠基者，如孫中山、秋瑾、黃興等。從十九世紀末到抗日戰爭前，在中國的留學生中，最大部分是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對西方知識的接受，有很長一段時間，或者是通過日本，或者是繞道蘇聯。中國由於歷史的誤會，或者是由於過於強力的趕超願望和自尊，似乎在很長時間裏一直在躲避成為西方信息的直接接受者。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留學歐美的熱潮，是同庚款興學分不開的。曾為留美幼童留學生的梁誠1905年時為清政府駐美公使，他通過美國外務大臣說服美國總統於1908年簽了退款協議，同意將庚子賠款中所得過多部分，用於支持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和興辦清華學堂等發展教育文化事業之用。據統計，1905-1924年共派出留美學生689人，到1936年出國留學者為4,000人。1937年抗戰爆發後，遽減為每年幾十人，到1943年勝利在望，政府把公費留學生增加為1,000人。是這些留學生把西方的知識帶進中國，一步步地在中國建立了現代的教育和科學體系。在1912到1934年，中國的大學從四所，發展到七十九所。有學者統計，在抗戰前擔任過大學校長的

留美學生估計有近一百人，如張伯苓、梅貽琦、郭秉文、竺可楨、吳貽芳等。中央研究院、各大學的物理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等研究機構，一批新學科、新教材，都是由這一時期的留學歐美的學生回國創建或編寫的^⑮。

在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的內閣中，另一留美幼童梁敦彥任外務大臣。這是留學生在中國第一次成為部委級官員，但離他歸國已有三十年。民國初年海歸在九個部的十八個部長中佔十五個席位。北洋政府換了三十二屆內閣，歷任國務總理和內閣成員中，分別有41-93%為海歸。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裏83%是海歸。1949年以後中國的三代領導核心中，多人曾留學法國和蘇聯。1988年4月組成的國務院的四十五位成員中，有十四人曾在蘇聯和東歐留學。現在中國的國務院中，多位部長曾經留學歐美。

如果從文革開始算，中國的留學史中斷了十多年。如果從1949年算，中國中斷了向西方國家的學習有三十年。在這一段時間裏，愈有知識愈反動，愈沒知識愈光榮。直到改革開放，知識才重新登上了神聖的殿堂。但回頭看世界，在東亞經濟體中，中國不僅已落後於日本，而且已遠遠落後於四小龍。1978年，復出的鄧小平向中央建議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突然打開的大門，迸發了長期被壓抑着的對知識的渴望。據統計，1949年前，中國的出國留學生一共大約有十至十五萬人（其中到日本有五萬）。據中國的教育部根據中國駐外使館的資料統計，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的出國留學人員已達到九十三萬人。其中已回國的至少有二十三萬人^⑯。

海歸人員最先集中的地方，首先是中國的教育和科研機構。據統計，中國科學院院士的81%、技術科學院院士的54%、中國863計劃中的首席科學家的72%都是海歸。在教育系統中，78%的高校校長、62%的博士生導師都是海歸^⑰。很多與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相關的新學科，都是由這些1980年代以後的新海歸建立的。經濟學、管理學、傳播學、社會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或者是重新引進建立的，或者是其概念和規範體系在這一二十年裏起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可以說世界上最新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大學中都能看到有中國學生在學習研究。中國基礎教育和大學教育，已經和現代的世界知識體系建立了全面的接口。每年二三百萬的大學畢業生、上千萬的中專生和高中生，源源不斷地為中國的經濟起飛提供了充足的、基本掌握了現代知識的人力資源。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中國的留學和海歸中的自費留學生愈來愈多，他們愈來愈多地進入企業界。有的在外資企業和跨國公司中，負責技術和管理；有的在金融界，做投融資、IPO業務；有的在國有大企業中負責海外市場開拓、購買、兼併；有的自己創業，建立各種網絡公司、新能源公司、新材料公司；也有的經過多年的拼搏，已經成為著名的上市公司的總裁、跨國公司的帶頭人。

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東亞家庭具有了支持子女出國留學的條件。台灣的數據顯示，從1980到1995年，台灣從海外歸來的留學生共有45,118人，其中37,061人有碩士學位，7,256人有博士學位，其

他801人^⑥。據中國教育部的預測，到2010年，中國的出國留學人數，將從現在的十一萬多人，提高到二十萬人；到2020年，將進一步提高到三十萬人^⑦。留學和海歸的大潮，是一浪高過一浪。

在東亞各經濟體中，尤其是在中國的各地和各部門，在各個層次上，都有更多的現代容閎和梁誠，在促進着更多的留學生和海歸，去完成西天取經的九九八十一難，去衝破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最後隔閡，實現現代人類應有的權利和能力——知識的即時共享。

註釋

① 高希均、李誠主編：《知識經濟之路》(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6-7。

② 費孝通：〈中國古代玉器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戰線》2003年第6期，頁1-4。

③ 參閱陸玉林著，張立文主編：《東亞的轉生——東亞哲學與二十一世紀導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④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6)，頁331-33。

⑤ 華人社會認為人生的四大樂事為：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

⑥ 東亞的教育中，同時也一直存在着過份追求學習成績，追求名牌學校，實行填鴨式教學，高壓鍋式教學，扼殺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傾向。本文因受主題所限，不便在此展開討論。

⑦ 一些學者認為，東亞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徵是積極的學習主義。這與今日亞洲各國的教育水準高，文盲率低，頗有聯繫。參見中島嶺雄著，謝森展編譯：《中日韓經濟展望》(台北：創意力文化事業公司，1987)，頁143。

⑧ 《金陵晚報》，2006年10月22日報導，1986年十八歲的陳寧適逢有去美國留學的機會，他父母的月工資僅150元人民幣，硬是到處籌款，讓他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全球教育摘要〉，轉引自《華聲報》，2006年6月2日。

⑩ 孔繁軍等：《走出中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8-27。

⑪ 當時之人張之洞說：「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張之洞：〈勸學篇〉(外篇：遊學第二)，載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十二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9737-38。

⑫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1。

⑬ 謝長法：《借鑑與融合——留美學生抗戰前教育活動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32-92。

⑭ 參見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www.edu.cn/article/20060622/3196538.shtml。

⑮ 參見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04/03/01/64/news219256465.shtml>。

⑯ 孫震：《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52-53。

⑰ 參見無憂雅思網，www.51ielts.com disp.asp?num=47897。

黃朝翰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學術所長，教授。

楊沐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訪問研究員，經濟學博士。